

作者弗洛伊德*

——福柯论弗洛伊德

张 锦

内容提要 福柯在讲稿《什么是作者?》中主要论说了“作者”概念是以何种功能、方式与现代社会的运行体制相关的,即“作者”是怎样被资本主义社会建构和命名的,它又在资本主义社会的这种发明中起到什么样的维系现有文化机制的作用。福柯否定了“作者”这一概念的自明性,他没有在纯文学的意义上分析“作者”问题,正如齐格尔所说,他将文学与作者问题提升到“自我批判”而不是内部批判的层次上。除此之外,福柯还在该文讨论了不同于文学作品“作者”的另一种“作者”概念,如科学的奠基者和“话语性的创始人”,并明显将后者的位置置于前者之上,马克思和弗洛伊德都是福柯意义上“话语性的创始人”。本文将结合福柯几本重要著作,论述福柯为何在上述讲稿中认为弗洛伊德是他所理解的“作者”,即“话语性的创始人”,以丰富我们对“作者”这一概念的认识。

关键词 作者 话语性 福柯 弗洛伊德

DOI:10.16345/j.cnki.cn11-1562/i.2017.04.001

福柯在其重要著作《古典时代疯狂史》、《疯癫与文明》、《词与物》、《临床医学的诞生》、《规训与惩罚》、《性经验史》等中都在论述问题的关键时间点和事件上反复征引弗洛伊德,足见弗洛伊德作为福柯的对话对象、作为19世纪思想与话语模式奠定者和标志性人物的重要位置。在福柯看来,弗洛伊德是19世纪产生的非常独特(assez singuliers)的“作者”,他是“话语性的创始人”(fondateurs de discoursivité);他将人文科学阐释与分析的对象从“功能、冲突和意义”引向了“规则、规范和体系”,^①并将“人”的精神经验置入了“科学”对象的研究领域,实现了人的精神的

对象化,弗洛伊德因而在人的客体化同时也是主体化的问题上位置关键。本文将主要以福柯的著作为参考,并结合弗洛伊德的著作,具体说明福柯为何认为弗洛伊德是他所认为的19世纪独特的“作者”。

一、19世纪独特的作者: “话语性的创始人”弗洛伊德

为了回应大家对《词与物》中塞万提斯、萨德、林奈、布丰、居维埃、李嘉图、马克思、弗洛伊德、孔狄亚克等“具体人名”或

* 本文系2016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西叙事传统比较研究”(项目编号:16ZDA195)的阶段性成果。

者说“具体作者名”反复使用的质疑,福柯在《作者是什么?》这次演讲中论述了他对“作者”概念以及“作者功能”概念的思考。^②在这篇演讲中,福柯所谓的“作者”并不只指文学作品尤其是小说的作者,还包括科学奠基人和“话语性”^③的创始人,福柯进而区分了文学作者、科学奠基者与“话语性的创始人”之间的差异性。福柯首先指出“在19世纪的欧洲,出现了一类独特的作者,他们既不应该被与那些‘伟大的’文学作者相混淆,也不应该被与那些经典宗教文本的作者和科学的奠基者相混淆。虽说多少有些武断,我们不妨称他们为‘话语性的创始人’。”^④所以,在福柯看来他要讨论的“独特作者”是一个既定历史时代和空间的产物,19世纪是个重要的历史前提。19世纪欧洲产生的这类独特作者不同于伟大的荷马、亚里士多德,不同于教会的神父们,也不同于最早的数学家和希波克拉底传统的创始者这样的“跨话语”(transdiscursive)^⑤作者,福柯称他们为“话语性的创始人”。19世纪这类作者的独特性在于“他们不仅是他们自己著作,他们自己书的作者,而且他们生产出了更多的东西:构成其他文本的可能性与规则。在这个意义上,他们完全不同于像小说家这样的作者,后者实际上只是他自己文本的作者。而弗洛伊德就不仅仅是《梦的解析》或《诙谐及其与无意识的关系》的作者,马克思就不仅仅是《共产党宣言》或《资本论》的作者:他们都确立了话语的无限定的可能性”。^⑥这类作者生产出了话语增殖的方式和基础,他们奠定了其他人说话的话语范式,也成为其他文本得以产生的“可能与规则”,其他文本或阐释或举例或应用或创造性改写他们,但相关话语的前提都是他们。在这里福柯举了马克思和弗洛伊德两个例子,说明马克思和弗洛伊德正是福柯认为的“话语性的创始人”,也就是说正是在“话语性的创始人”的意义上,福柯提出了弗洛伊德独

特的19世纪“作者”的身份。

关于弗洛伊德对19世纪思想的话语性塑型意义,福柯在《词与物》中解释“阐释和形式化”我们时代这两种重要的分析形式时这样说“这就恰当地说明了19世纪向思想的形式主义和向无意识的发现——向罗素和向弗洛伊德的双重迈进。这也说明了人们的种种愿望,即使其中一个进程转向另一个进程并使两个方向相互交织在一起:例如,想阐明纯形式的尝试,这些纯形式早在任何内容之前就强加在我们的无意识上面;或者是使经验的基础、存在的意义、所有我们的认识的实际的境遇全都直抵我们的话语的努力。”^⑦弗洛伊德的“无意识”帮我们确定了阐释无法抵达却早已存在并成为我们阐释动力机制与源泉的区域。福柯认为弗洛伊德的“无意识”之所以重要,并不仅是指他的分析到达了人的意识以下的层面,而更重要的是指他的“无意识”概念与领域提供了人的意识以外的知识的前提和保证,这正如福柯讨论人种学与精神分析的关系时所说“像精神分析一样,人种学并不询问人本身,如同能在人文科学中那样显现的人,而是询问通常使得一种有关人的知识成为可能的区域。”^⑧人种学在西方产生的背景和前提我们现在都非常清楚了,它并不是要研究人本身,而是要建立关于人的知识与历史的某些标准以对人种进行常常是系关优劣的区分。与人种学共处于同一知识型内,这二者,即“人种学和精神分析必定都是两门有关无意识的科学:这不仅是因为它们在人身上都达到了人的意识以下的层面,而是因为它们都走向那在人之外使得人能凭一种实证知识而知晓的一切,都走向那呈现给或逃避人的意识的一切。”^⑨而且精神分析因为对“无意识”的发现和阐释而与精神分析共同确立起了“个体的历史与文化的无意识”以及“文化的历史性和个体的无意识”这两种对现代欧洲知识叙述方式与内容而言的根本性范式“我们懂得了精神分

析和人种学应是相互面对面地、在一个基本的相关性中被确立起来的：自从《图腾与禁忌》以来，一个为它们所共有的领域的确立，能毫无间断性地从一个过渡到另一个的话语的可能性，个体的历史与文化的无意识以及文化的历史性与个体的无意识这样的双重连接，可能展现了关于人而提出的最一般的问题。”^⑩这两门范式性学科不必然但却一定跟对种族和个人的殖民与暴力相关。“这并不是说，殖民的境地对人种学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在医生幻影似的角色中的催眠或病人的疯癫都不构成精神分析；但是，诚如精神分析只有在一种特殊关系的寂静的暴力和由这种关系呼唤的迁移中才能展现出来，以同样的方式，人种学也只有在欧洲思想所具有的和能使欧洲思想像面对自身那样面对其他所有文化的那种关系所具有的历史的统治权（虽始终是克制的，但也始终是现实的）中，才能获得其特有的维度。”^⑪所以精神分析和人种学并非普通的学科，它们与现代欧洲的历史境遇直接相关，我们从这一点也能理解现代欧洲的知识话语方式怎样与其殖民的历程相关且共谋，进而证明这些话语在型塑现代欧洲主体方面的范式性意义。

言归正传，具体而言，福柯认为“最早、最重要的话语性创始人马克思和弗洛伊德”与科学奠基者或一般的小说家不一样的地方在于以下三个方面。首先，“当我谈及作为‘话语性的创始人’的马克思和弗洛伊德，我的意思是他们不仅使大量的‘类似’成为可能，（而且同样重要的是）他们还使大量的‘差异’成为可能。他们为引进他们话语之外的一些要素打开了空间，但这些要素仍然属于他们所开创的那个话语领域。我们在说弗洛伊德开创了精神分析的时候，意思不是说（意思不只是说）在阿布拉汉姆（Abraham）或米莱尼·克雷恩（Melanie Klein）的著作中，重新出现了力比多的概念或关于梦的分析技术，而是说对于他自己的文本、概念和假设而言，弗

洛伊德使得某些差异成为可能，而这些差异都源于精神分析话语自身。”^⑫弗洛伊德奠定了关于“梦”和“无意识”的学说，这个“奠定”是话语方式意义上的，而不是言说内容意义上的，所以在精神分析的领域内，弗洛伊德的继承与反对者可以根据弗洛伊德的概念和假设生成许多相似性的思考，但也可以生成许多差异性的思考，无论是相似还是差异，这些思考都没有脱离精神分析的话语域，是其问题的类比、类推、延续、补充或者反对。其次，“话语性的创始对其后来的转变而言是异质性的。要拓展某种话语性，例如要拓展弗洛伊德创始的精神分析，并不是要给予精神分析一种它开始并没有接受的形式普遍性，而只是为精神分析打开一定数量的应用可能性。要限制精神分析，那实际上就是试图在弗洛伊德的创始行为中分离出一些可能是数量有限的、只有它们才具有开创价值的命题或陈述，与它们相比，弗洛伊德所接受的其他某些概念或理论被认为是衍生的、次要的和从属的。”^⑬“话语性创始”自身是异质性的，某种话语性或者说话语实践、话语范式产生后的讨论是这个话语性派生的，或者是对它的应用、例证和进一步拓展，但需要强调的是“话语性创始”与其应用是异质性的存在，前者是对后者的可能性和规则的限制。最后，“话语性创始”与科学实践创始不一样的地方还在于“在这些话语性的领域，‘返回起源’（retour à l’origine）是不可避免的必然。”^⑭在这里，“返回”（retour）这个词标示出了话语性完全不同的特征和独特的意义。“‘返回’一说指一种有其自身特性的运动，它概括出了话语性创始的特征。如果要有返回，首先必须是发生了遗忘，这种遗忘是根本的、建构性的，而不是偶然的遗忘，也不是因为不理解而导致的淹没，而是根本的、建构性的遗忘。”^⑮也就是说，对于话语性创始而言，如果日后的应用过于庞杂或者莫衷一是或者不知所云或者分歧很大，那么我们需要做

的是“返回”话语的起源处，那里规定了日后各种言说的相似性基础是什么，对那里的遗忘是分歧产生的重要原因。另外，对于话语性创始而言，如果要创新，也必须返回话语的起源处“向着文本的返回是使话语性发生改变的一种有效且必要的手段。重新考察伽利略的著作，也许将会改变我们关于机械学史的知识，但不会改变机械学自身。而重新检视弗洛伊德或马克思的著作，则会修正我们对精神分析或马克思主义的理解。”^⑩也就是说，向着话语性创始之处的“返回”是为了话语性创新，为了转型，也只有“返回”才能创新，才能转型，才能引入修正，才能生产出异质性的有益思想，否则，我们就无法真正实现与话语性创始者的对话。这对我们今天思考人文学科也是极有启发的——返回话语的起源处。这种返回因为与机械学等自然科学和小说等文学领域不同，所以非常值得注意，因为这种“返回”进一步确保了话语创始者即作者与其话语之间的紧密关联，这也是为什么越返回我们越离不开马克思，离不开弗洛伊德，我们对话语性越想创新、越想修正、越想转型也就越离不开向马克思、弗洛伊德原典的返回。福柯说“这些返回的最后一个特征在于，它们会导致作品和作者之间神秘难解的缝合……相反，《精神分析概论》的被发现，由于它是弗洛伊德的文本，它改变的就不是有关精神分析的历史知识，而很可能是整个精神分析的理论领域——哪怕只是通过侧重点或重心的移动来改变。这样的返回运动是我所谈论的这些话语场域的轨迹本身，它们在‘原创’作者与间接作者之间构成某种关系，这种关系不同于把一篇普通文本与其直接作者联系起来的关系。”^⑪这些返回使作者与作品之间的关系更加紧密，与一般的文本和作者关系不同，这种话语性创始者与其作品关系的任何改变即“哪怕是侧重点或中心的移动”，都会影响整个这个理论场域及其对之的理解与阐发，所以要想

转变对这个理论领域的理解，必须返回这个创始性话语本身。对于这种“返回”拉康特别同意福柯的观点，并且非常感激福柯，拉康在演讲之后回应说“我很晚才接到邀请。我读了以后，注意到了最后一段，即‘返回到某某’。人们可能返回到很多地方，但是，最终，返回弗洛伊德是我作为一种旗帜的东西。在某些方面我非常感谢你。你回应了我所期待的。关于弗洛伊德，我特别提示这种‘返回’的意义。你所说的一切至少完全恰当地表达了我所做的一些工作。”^⑫拉康就是从“忠实地返回”弗洛伊德入手，创立了他自己时代的、融入了自己问题意识和历史意识的拉康学派。拉康对“返回”的回应使我们能够更加形象地把握福柯所说的只有向话语性创始者的返回才能带来理论新的转变这一思想。

二、从“功能、冲突和意义” 过渡到“规范、规则和体系” 的分析

弗洛伊德获得如此重要的话语性创始人位置，其根本之处正在于“如果考虑到是弗洛伊德，而非其他人，使人的认识接近其语文学的和语言学的模式，但想到也是弗洛伊德首次着手彻底消除肯定与否定（常态与病态、可领悟与不可沟通、能指与非能指）之间的划分，那么，我们就能理解他宣告了一种依据功能、冲突和意义的分析过渡到一种依据规范、规则和体系的分析：这正如这整个知识（即在这个知识的内部，西方文化在一个世纪中为自身提供了人的某个形象）都围绕着弗洛伊德的工作转，而没有因此摆脱其根本的布局。”^⑬弗洛伊德使得关于人、人文科学的分析接近了语文学和语言学模式，这一点非常重要，澄清这一点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入地理解弗洛伊德的工作及其对欧洲思想、理论甚至现实的重要意义。这里所谓的语文学模式可以参照

下面的论述来理解 “《资本论》第一卷是对‘价值’所作的一种诠释；尼采的所有著作都是对几个希腊词的一种诠释；弗洛伊德的著作则是对所有这样一些沉默语句的诠释，这些语句既支撑着并且同时又挖掘我们明显的话语、我们的幻想、我们的梦想和我们的肉体。语文学，作为对在话语深处的表述所作的分析，已变成了现代形式的批判。”^②在福柯看来，语文学是现代思想形式和现代批判方式的表征，即语文学的结构构成了现代批判的形式，也就是说现代知识反思与建构的形式、现代历史书写的形式。^③语文学为现代欧洲所构造的知识阐释的空间是 “马克思通过对‘价值’所做的历史性分析、批判、诠释和反思成为我们思考资本主义社会运行方式得以确立的基础，尼采对几个希腊词的诠释使得一种新的对语言、知识和认识的质疑成为可能，弗洛伊德则通过对支撑我们显在话语的沉默话语的分析和诠释来重构人的意识和肉体领域。”^④关于语言学模式，弗洛伊德在《精神分析引论》中也说道：“梦的工作的这种奇怪现象，幸而在语言发展上可以找到类比。”^⑤所以这里要特别强调的是福柯认为弗洛伊德对人的分析接近了语言学模式，这并不是说弗洛伊德用了语言学模式来分析人，而是说它们共处于相似的分析方式中，即语言学或语文学式的分析方式，语言学模式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或类比精神分析的模式，精神分析的分析方式与语言学模式是平行的关系，它们都是那个时代知识分析方式的体现，它们共享相似性的知识型，所以由语言学模式可以类比精神分析的模式。弗洛伊德说 “梦的工作的这些特征可称为原始的（archaic）。它们依附于语言文字的原始表示方式，其难于了解之处也不亚于原始的语言文字。”^⑥弗洛伊德的确以原始语言或者说语文学的对象来类比梦的解析对象，即梦的工作。而弗洛伊德之所以释梦，并不是因为他对梦有兴趣，而是因为梦的“这些象征的关系并不是梦所特有的，

因为我们已知道同样的象征也见于神话和神仙故事，也见于俗语，民族，散文和诗歌之内。”^⑦所以弗洛伊德是要借助梦的象征性来阐释神话、俗语、民族、散文和诗歌等各种文本的意义。这样，精神分析就不仅仅是一个学科，而是一个普遍性的人文学科知识的阐释基础和方式 “我们所有和梦的象征相平行的事实可以使你们懂得精神分析何以引起普遍的兴趣，而心理学和精神病学则不如此；精神分析的研究和许多其他学科——如神话学，语言学，民俗学，民族心理学及宗教学——有很密切的关系，而研究的结果又给予这些学科以有价值的结论……人类个体的精神生活接受精神分析的研究，其所产生的结果可用来解决人群的许多生活之谜，或者至少也可给这些问题以解决希望。”^⑧所以精神分析并不是要解决一个学科的问题，它与心理学和精神病学这些病理学科不一样，它提供的是一个普遍的关于人的范式，这一点我们在本文第一部分也作了说明。精神分析对神话学、语言学、民俗学、民族心理学、宗教学、文学都有意义，因为在弗洛伊德看来对人类个体的精神生活进行精神分析的研究，可以解决人群的生活之谜，这也回应了我们上文所讲的精神分析与人种学的相同现代功能和构造，即“个体的历史与文化的无意识”以及“文化的历史性和个体的无意识”。所以当我们在“性”的具体分析和解读意义上认同或不认同弗洛伊德的时候，恰恰误解了他，他要做的是梦的“象征”性分析，而不是梦的细节研究。因而弗洛伊德说，“要撰写梦的问题科学研究史是一件难事，”^⑨因为这项科学研究史关涉的是整个象征领域。弗洛伊德的“目标是要证明梦是可以解释的”。^⑩他认为“‘解释’一个梦就意味着给梦指派一种‘意义’”，^⑪而给梦指派意义的过程，正在于发现梦的隐意及其象征性 “梦总有一种意义，即使是一种隐意；做梦是为了代替某种其他思想过程，只有正确地揭示出这个代替物，

才能发现梦的隐意。”^③由此可见,弗洛伊德释梦的目的不在于梦本身,而在于通过梦的隐喻来阐释人、社会和文化,阐释社会的“规范、规则和体系”,即通过梦来揭示意义的生成规则及其背后的力量。因而弗洛伊德坚持认为:“梦确实包含着意义,用科学方法释梦是完全可能的。”^④弗洛伊德正是要通过梦来处理一个哲学问题:在告别上帝的时代后,现代人的能产性和动力来自何处——这种动力不是来自有意识,而是无意识机制。在引入最关键的“规范、规则和体系”的阐释转向之前,福柯还补充了另一个前提,即“弗洛伊德首次着手彻底消除肯定与否定(常态与病态、可领悟与不可沟通、能指与非能指)之间的划分”。“肯定与否定、常态与病态、已思与非思、可领悟与不可沟通、能指与非能指”之间是根本性的、本质区别,还是只是一个量的差别,这涉及对病理学、生理学,当然更重要的是对人的科学的完全不同态度和思考方式。福柯的思考受其老师康吉莱姆影响,康吉莱姆在其《正常与疾病》一书中就分别讨论了当时非常重要的病理学家对糖尿病的态度,这个态度的根本就是糖尿病是量的差异还是有质的标准作为前提,康吉莱姆以此为基础说明了不同医学家对病理学与生理学关系的理解,并将这种病理或生理学的讨论引向了对一般人文科学理论思考。正是在这本书中,康吉莱姆说“夸张的版本往往比忠实的版本更能够反映某种形式的本质。”^⑤所以病态是对常态的揭示,这一点用来理解弗洛伊德也很恰当。弗洛伊德消除了常态与病态之间的划分,而代之以意识一无意识理论,实际上他把每个人都纳入他的思考范围,因而他的理论的覆盖面非常广,以前精神医学不顾及的“正常人”也成为他的分析对象。在弗洛伊德那里,尽管有“精神病人”,但实际上“人”是没有常态和病态之分的,有的只是意识和无意识关系的此消彼长,所有的“人”都可以在他的体系中

获得阐释,病态只是对常态的延伸或者揭示,因为重要的不是你的症状,而是症候背后的规则。正常人都会有口误,这背后是有体系、规则和规范可寻的,所以重要的不是你的口误,而是它背后的语言和意义体系。因而,福柯得出了一个关键的结论,即弗洛伊德“宣告了一种依据功能、冲突和意义的分析过渡到一种依据规范、规则和体系的分析”。“功能、规范和冲突”与“规则、意义和体系”,这三组二元对立分别对应的是福柯在《词与物》中主要分析的三个经验生活的领域,即生物学、经济学和语言研究。这里的生物学、经济学和语言研究是指19世纪人文科学领域的知识和阐释状况。19世纪,人们从分析比较复杂多元和偶然的生物功能或刺激、经济冲突或矛盾、言语的意义过渡到了分析生物背后的规范、经济背后的规则和语言背后的体系,即那些象征系统,而不是具体的能指符号。这三个象征系统在19世纪以来的知识中体现为缺席却在场、永远无法抵达但却令人无限向往的三个重要命题——大写的死亡、大写的欲望和大写的律法“通过这三个形象,生命及其功能和规范就建立在大写死亡(La Mort)的寂静的重复之中,冲突和规则就建立在大写欲望(Le Désir)的裸露的开启之中,意义和体系就建立在一种同时是大写律法(Loi)的语言之中。我们知道心理学家与哲学家们如何称呼所有这一切:即称其为弗洛伊德的神话学。的确,弗洛伊德的这个方法在它们看来必定是如此:对于一种处于表象之中的知识来说,能朝向外去涉及和定义表象可能性的,只能是神话学。”^⑥弗洛伊德的伟大之处正在于他能从外部为19世纪的知识寻找合法性的依据,他触摸到了大写的死亡、大写的欲望和大写的律法,所以在福柯看来弗洛伊德神话学的本质即在于弗洛伊德正好表征了19世纪知识型——“人之死”,或者也可以说对大写的相似的再度寻找,^⑦这个相似性基础即无意识的巨大深

渊。因此，“人文科学只能在可表象物的要素中进行谈论，但依据的却是一种意识—无意识的维度，人们越设法阐明体系、规则和规范的秩序，这个维度就越明显。似乎常态和病态之间的二分倾向于为了意识和无意识的二极的利益而消失殆尽。”^⑤弗洛伊德宣告“一种依据功能、冲突和意义的分析过渡到一种依据规范、规则和体系的分析”，这种二项颠倒正是福柯在《词与物》中用来描述 19 世纪人文科学的重要依据：

我们也许可以从这三个模式出发，描述自 19 世纪以来的所有人文科学。实际上，这三个模式覆盖了人文科学的整个生成变化，因为我们可以自一个多世纪以来追踪其特权王朝：首先是生物学模式的统治（人及其心理、群体、社会、所谈的语言在浪漫主义时期都是作为生物而存在的并且就其实际上生活着而言的；它们的存在方式是有机的并且人们根据功能来分析这个存在方式的）；接着是经济学模式的统治（人及其所有活动都是冲突的场所，既是其或多或少明显的表现，又是其或多或少成功的解决）；最后——如同在孔德和马克思之后是弗洛伊德——开始了语文学的（当涉及到阐释和发掘被隐藏的意义时）和语言学的（当涉及到构成和阐明指称体系时）模式的统治。因此，一个宽广的漂移把人文科学从一种充满着生物模式的形式引导向另一种较为充满着那些取自语言的模式的形式。但是，这个逐渐转变是从另一个转变复制而来的，即另一个转变使每一个构成性对子中的第一个项（功能、冲突和意义）退却，并使其第二个项（规范、规则和体系）的重要性更强烈地涌现出来。戈德斯坦、莫斯和杜梅泽尔差不多可以完全代表这样一个时候：在那时，每一个模式中的颠倒都实

现了。^⑥

福柯说一个世纪以来人文科学领域中的生物学模式被经济学模式接替，然后后者被语言学模式接替，但是在这个逐渐转变的背后更重要的是另一个颠倒，即阐释从功能、冲突和意义向规范、规则和体系的过渡。弗洛伊德就处在这条线路的关键点上。因为在生物学模式—经济学模式—语言学模式之间的接替与过渡背后，那个更重要的转变与颠倒越来越清晰，这个清晰的人物表征就是从孔德到马克思到弗洛伊德的话语转变，而这个转变的根本就是“规范、规则和体系”强烈涌现和“功能、冲突和意义”的退却。这里，如果说孔德对应了生物学模式、马克思对应了经济学模式，那么弗洛伊德则恰好对应了语文学或语言学模式。这也有助于我们理解弗洛伊德与语文学或者语言学的关系。我们前文反复强调语文学模式对于 19 世纪而言是现代形式的批判或者现代批判的形式，又强调弗洛伊德实现了某种重要的颠倒，那么二者关系如何呢？我们可以进一步总结一下，它们处在同一时期，二者可以类比、相互表征、揭示对方的逻辑和型构方式并表征它们时代的知识型，它们谁也不高于谁。弗洛伊德使类似语言学或者语文学模式的无意识—意识分析、体系—意义分析得以真正引入人文科学的阐释和话语领域，在人文科学阐释的领域复制语文学的结构，所以福柯才说弗洛伊德使得“人的认识接近其语文学的和语言学的模式”。同时，语文学模式本身又是对弗洛伊德所实现的二项颠倒的集中呈现与复制，所以可以简单说语文学模式就是弗洛伊德模式，或者无意识的结构就是语言。

三、应运而生的天才： 人的精神的对象化

弗洛伊德所实现的这种转变还有一层重要

的指向,即他实现了人的精神管理,被对象化为医学科学的对象。而他完成的这一切也并不完全是他主动的选择,正如福柯讨论“作者功能”概念一样,它是一种复杂运作的结果。弗洛伊德在《精神分析引论》中一上来设定研究对象时,针对的就是解剖临床医学。福柯在《临床医学的诞生》一书中指出,解剖临床医学使得人在生理学的意义上对象化了,从而成为医学的科学对象。而弗洛伊德要做的,是反对解剖临床医学的霸权,将精神现象科学化、对象化。医学和医生在现代社会的重要地位一方面在于解剖临床医学对人身体的把握,另一方面在于精神分析对人精神的掌控。这两方面都不仅仅关涉“健康”问题,而且更重要地关涉“人”成为知识的对象并成为知识的主体和方式这一问题。^⑦所以福柯说“人们不难理解在关于人的科学的体制中医学竟然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这种重要性不仅仅是方法论方面的,而且因为它把人的存在当做实证知识的对象。”^⑧医学不仅仅是一个认识人的方法论和视角,当人的存在被当做实证和经验知识的对象时,发生变化的将是所有人的科学的面貌,这也是为什么医学领域发生的事情与诗学、诗歌和哲学领域发生的事情同构。“‘比夏、杰克森和弗洛伊德’这几个名字应运而生,他们的声名并非来自他们揭示了解剖医学、神经医学和无意识领域在显露人的生命本质这个哲学问题上的贡献和发明,他们的声名恰恰来自欧洲文化发展到此必然要求了这种医学与哲学的关联;”^⑨“在这种文化中,医学思想完全与人在哲学中的地位相关联。”^⑩当然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在现代知识体系中,精神分析医师弗洛伊德的影响能够超越医学而渗透到各人文科学中。所以无论在临床医学、精神分析学、心理学、文学、哲学还是在历史、社会学等领域,发掘人的无意识和人之死都是可以联系弗洛伊德话语的功能。福柯在《词与物》、《什么是作者?》以及《性经验史》中不断强

调弗洛伊德的话语创始地位是“被要求”的,这一点同时消除了弗洛伊德的个人神话,而将知识的讨论域给予了整个社会与文化谱系,虽然这并不能否认弗洛伊德的天才性。

在《性经验史》中,福柯这样描述弗洛伊德“至少在弗洛伊德之前,关于性的话语——包括学者和理论家关于性的话语——也是一再对自己谈论的对象遮遮掩掩。”^⑪弗洛伊德实现了性话语的公开谈论,这个公开谈论看似为了治疗,在治疗的名义下性不必再被遮掩,但这绝对谈不上解放,因为在治疗名义下的暴力则是,你对他倾诉性经验,你的经验成为他的科学资料,你成为他的研究对象却要付费给他,他获得双重利益——金钱和科学对象与资源。这种对性经验、对个人生命经验的医学和科学话语捕捉导致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结果:“这就是说,生命进入了历史(我是说人类的生命现象进入了知识和权力的秩序之中),进入了政治技术的领域。”^⑫人类的生命现象进入了知识的领域,同时知识也获得了对生命的权力,这就是福柯所说的“生命政治”(biopolitics)的一部分内容,即生命成了被医学管理治理的技术领域与对象。弗洛伊德的位置应该在此意义上被理解,而他在此意义上也是应运而生的:

大家还会嘲笑曾反对弗洛伊德和心理分析的泛性主义的指责。但是与其说轻率的人是那些表达不满的人,不如说是那些通过反手一击把指责拒之门外的人,好像指责只是复活了古老的过分羞耻感的恐惧。因为前者只是惊讶于一种有着悠久历史的程序,而没有发现自己已经完全被这种程序包围了。他们把长期形成的东西归因于弗洛伊德的邪恶天才。他们还弄错了性经验的一般机制在我们社会里被建立起来的日期。但是,后者却弄错了这一程序的本质。他们相信弗洛伊德通过一种突然迂回

的方式把性应该得到的、但是长期以来颇受争议的部分归还给性。他们没有看到弗洛伊德的杰出天才把他置于 18 世纪以来由知识和权力策略划定的一个关键时刻上，他极富成效地重振了认识性和把性纳入话语之中的古老命令，堪与古典时代最伟大的精神导师比肩而立。^⑬

这里的两类人需要澄清，一类是“表达不满的人”，他们指责弗洛伊德，以为是弗洛伊德的邪恶天才导致了心理分析的泛性主义，但这类人不否认历史上对性进行谈论与管理的这一程序，他们讨论的是羞耻感的问题，另外，他们弄错了性经验机制在我们社会建立的日期。这类人误解了弗洛伊德，但福柯觉得另一个类人可能是更轻率和需要警惕的，即他们看似拒绝了对弗洛伊德的上述指责，但他们弄错了程序的本质，他们以为性是被压抑的，是弗洛伊德还给了性自由。事实上，福柯说，“他们没有看到弗洛伊德的杰出天才把他置于 18 世纪以来由知识和权力策略划定的一个关键时刻上，他极富成效地重振了认识性和把性纳入话语之中的古老命令，堪与古典时代最伟大的精神导师比肩而立。”弗洛伊德的天才之处在于再度把性纳入话语，纳入生命的塑造之中，这正是弗洛伊德堪与“古典时代最伟大的精神导师”相比肩的地方，他恢复了古老的律令。福柯在《性经验史》的后面几卷就集中讨论了古典时期的城邦邦主或有威望的人是如何在性经验的意义上处理他与妻子、男童、真理和自我的关系的，在这些关系里面性节制是自我塑造、是理想城邦邦主的一个关键方面。所以弗洛伊德是应 19 世纪求真意志而生的伟大天才。到了 19 世纪，“性已经被构成为一种真相赌注。因此，需要弄清楚的不是弗洛伊德或其他某个人发现的新的理性入门，而是 19 世纪留给我们的这一‘真相与性的相互作用’的逐渐成形（和转型）。”^⑭

在早期著作《疯癫与文明》中，福柯也是这么看待弗洛伊德的，所以福柯对弗洛伊德的判断是具有连续性的。福柯说：

这样，当精神病患者被完全交给了他的医生这个具体实在的人时，医生就能用疯癫的批判概念驱散精神病实体……正是这种情况使 19 世纪的全部精神病学实际上都向弗洛伊德汇聚。弗洛伊德是第一个极其严肃地承认医生和病人的结合关系的人，第一个不把目光转向别处的人，第一个不想用一种能与其他医学知识有所协调的精神病学说来掩盖这种关系的人，第一个绝对严格地追寻其发展后果的人。弗洛伊德一方面消解了疯人院的各种其他结构的神秘性：废除了缄默和观察，废除了疯癫的镜象自我认识，消除了谴责的喧哗。但是，另一方面，他却开发了包容医务人员的那种结构。他扩充了其魔法师的能力，为其安排了一个近乎神圣的无所不能的地位。^⑮

弗洛伊德重新打开了与疯人交流的机制，当然他也为医生取得了一个上帝一样神圣的位置。这一点与他在《临床医学的诞生》中的论述相似。精神分析医师拥有知道疯人秘密、治疗疯人的绝对权力，疯人在精神分析的意义上被对象化了，所以成为精神分析话语的对象是疯人主体新的代价。在刑罚的领域也一样，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谈到惩罚和塑造“灵魂”对象，刑罚的目标在 19 世纪变成了人的精神。“既然对象不再是肉体，那就必然是灵魂。曾经降临在肉体的死亡应该被代之以深入灵魂、思想、意志和欲求的惩罚……这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时刻。”^⑯这种对灵魂的深入和普遍治理是现代刑罚的根本目标。刑罚与心理学、精神科学、社会科学紧密结合，使得“灵魂”成为被再塑造的对象，社会要矫正和管理的是一个

人的性格和灵魂,同时通过精神医学将灵魂和精神对象化、客体化、知识化。解剖临床医学对人的身体进行了科学化、客体化和对象化,而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对精神和灵魂进行了科学化、客体化和对象化,人在两方面全面被客体化、对象化正是人的现代遭遇,虽然作为补偿人同时也成为主体。

在福柯看来,弗洛伊德就是这样一个“话语性创始人”意义上的作者,他是奠定了19世纪独特知识言说方式的权威,他实现了阐释向“规则、规范和体系”的转向,他也促成了人的精神的对象化,他的天才与时代的要求同样重要,我们越是看到他的话语性创始人的重要性与天才性,也越能体会他对时代的意义和他如何被现代知识所要求。

注释:

① 关于什么是福柯所谓的“功能、冲突和意义”,什么是“规范、规则和体系”,福柯这样描述“这些构成模式是在生物学、经济学和语言研究这三个领域获取的。正是在生物学的投影的表面,人才显得是一个具有种种功能(fonctions)的存在——即接受刺激(既是生理学的,但也是社会的、人与人之间的、文化的刺激),对刺激做出反应,适应、进化和服从周围环境的要求,随着由环境强加的改变而进行组合,设法消除平衡,根据规则行动,总之,具有生存的条件并有可能发现那些使人能履行其功能的折衷的调解规范(normes)。正是在经济学的投影表面,人才显得是具有需求和欲望,设法满足需求和欲望,因而具有利益,追求利润,与其他人相对立;总之,人出现在一种不可克服的冲突(conflit)的境遇中;人回避、躲避或终于能支配这些冲突,终于能发现一种解决办法,这个办法至少在一个层面上和一度平息了其种种矛盾;人创立了一组规则(règles),这些规则既是对冲突的限制,又是重新激发冲突。最后,正是在语言的投影的表面上,人的行为才显得是想说些什么;从人小小的动作,直至这些动作的并非所愿的机制和失败,都具有一种意义(sens);人通过物体、仪式、习惯和话语而在自己周围放置的一切,人在自己身后留下的一切足迹,都构成了一个融贯的整体和一个符号体系(système)。这样,功能和规范、冲突和规则、意义和体系,这三组对立项完整无遗地覆盖了有关人的认识

的整个领域。”参见福柯《词与物》,莫伟民译,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版,466页。

- ② 详见张锦《解剖学与“人之死”——论福柯的“死亡抒情性”问题》,载《跨文化的文学理论研究》第6辑,知识产权出版社2014年版,69-84页。
- ③ “话语”的概念是20世纪理论术语的关键词,由于今天我们已经太熟悉该术语了,它已经成为我们讨论问题的常识性和前提性概念,所以本文不再花费篇幅论述此概念,我们直接以之为基础讨论问题。
- ④ Michel Foucault, “Qu’est-ce qu’un auteur?”, *Dits et écrits*, Vol. I, 1954-1975 (Paris: Éditions Gallimard, 2001), p. 832.
- ⑤ Michel Foucault, “Qu’est-ce qu’un auteur?”, p. 832.
- ⑥ Michel Foucault, “Qu’est-ce qu’un auteur?”, p. 832-833.
- ⑦ 福柯《词与物》,390-391页。
- ⑧ 福柯《词与物》,494页。
- ⑨ 福柯《词与物》,495页。
- ⑩ 福柯《词与物》,496页。
- ⑪ 福柯《词与物》,492-493页。
- ⑫ Michel Foucault, “Qu’est-ce qu’un auteur?”, p. 833.
- ⑬ Michel Foucault, “Qu’est-ce qu’un auteur?”, p. 834-835.
- ⑭ Michel Foucault, “Qu’est-ce qu’un auteur?”, p. 835.
- ⑮ Michel Foucault, “Qu’est-ce qu’un auteur?”, p. 836.
- ⑯ Michel Foucault, “Qu’est-ce qu’un auteur?”, p. 836-837.
- ⑰ Michel Foucault, “Qu’est-ce qu’un auteur?”, p. 837.
- ⑱ Michel Foucault, “Qu’est-ce qu’un auteur?”, p. 848.
- ⑲ 福柯《词与物》,471页。
- ⑳ 福柯《词与物》,389页。
- ㉑ 关于语文学与现代知识、现代学科对象的关系,关于语文学在现代知识谱系中的根本性地位以及语文学与现代语言的功能,详见张锦《福柯的“异托邦”思想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332-342页。
- ㉒ 张锦《福柯的“异托邦”思想研究》,341页。
- ㉓ 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论》,高觉敷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135页。
- ㉔ 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论》,137页。
- ㉕ 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论》,126页。
- ㉖ 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论》,127页。
- ㉗ 弗洛伊德《释梦》,孙名之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5页。
- ㉘ 弗洛伊德《释梦》,92页。
- ㉙ 弗洛伊德《释梦》,92页。
- ㉚ 弗洛伊德《释梦》,92页。
- ㉛ 弗洛伊德《释梦》,95页。
- ㉜ 乔治·康吉莱姆《正常与病态》,李春译,西北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30页。